

教育大學的理念

Ruth Hayhoe（許美德）

多倫多大學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長

本人至為榮幸地接受邀請，在此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大學校長共享今晚的盛會。希望各位容許我與大家分享一些個人見解，包括出任香港教育學院第二任院長的體驗。我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出任院長一職，適逢香港回歸，我們本來的九所校舍搬遷到位於大埔環境優美的新校園。

我的專業背景是在比較高等教育領域。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研究中國的大學，並協助國內的師範大學開辦首批博士生的專業課程。此前，我曾於本港的中學任教。然而，從事這麼多年的教學、研究、發展工作，卻從未聽說過教育大學！

當我在九七年來到香港教育學院時，教院主要提供學前、小學、初中教學的非學位課程。我的任務十分清晰，就是把教院的這些課程進行提升，讓學生能考獲學士或深造學位。當時，我們需要把課程內

容、教員資質、教學及學術研究提升至大學的水平。與此同時，我亦深切注意教院在九四年由五所學院合併之前已形成的豐富的專業知識傳統。這些傳統包括與香港各區的幼稚園和中小學校的緊密關係，以及優秀的專業實踐標準，諸如在課程編排、綜合課程發展、幼童語言和數學教育、以及俗稱「術科」如音樂、視覺藝術、體育和舞蹈方面。

因此，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保留多年來的教學傳統，並以此為根基，將教院的學術水平提升，向本港的其他大學看齊。也就是我們如何啓動各種各樣的學術研究，在學術性的嚴格和相關上同時照顧本港教師、學生、學校的需要？

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使我著眼於大學和師範大學或教育大學在核心價值觀上的深遠分歧。前者源於西方社會，後者則在二十世紀才整合進入大學。兩者在不同的年代創立，這些價值觀有所分歧不足為奇。大學在十二世紀的歐洲創立，當時同業工會和商業城鎮剛開始盛行；而師範學校則是在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初創立，當時有不少新生的國家誕生。這些國家承擔教導兒童共和理念，培訓他們投身正在工業化的社會。

當我思量這兩類各具特色的組織機構的關係時，突然悟覺與歐美

大學傳統迥異的東亞知識和高等教育的傳統可能起到架接它們之間分歧的作用。有鑒於此，反思第一所自稱“教育大學”的學府——創立於六十年代的日本，以及此後在亞洲其它國家漸漸興起的同類學府，便變得非常有意義。

作為具備大學水準並以教育為領先領域的教育大學模式，為如何升級香港教育學院並保持甚至強化其五所學院的深厚傳統，提供了非常明確的答案。我接著將進行一個簡明的比較性的歷史回顧，為對教育大學的本質特點進行理解提供一個背景。我會先談出現於十二世紀歐洲大學的辦學理念，再談於十九世紀創辦師範學校時截然不同的辦學理念。而師範大學是在法國大革命後創立，可說是融合前兩類學府的辦學理念。然後，我會談及東亞的例子，並就中國的傳統學府作出一個比較性的反思，從中可看到中式的辦學理念跟歐洲的大學大相逕庭，但與師範大學卻甚為相似。

中世紀的歐洲大學

發軔於十二世紀的歐洲大學，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其核心的辦學理念，亦即學術自由和自治，仰仗於中世紀歐洲的三個重要機構。當時的教宗和羅馬天主教教會，於憲章中明確授予大學獨立的法律地位，讓大學有權擁有物業，以此保護它們免受當地

政治或教會的干預。在民族國家產生之前，這些大學已經事實上是國際性的，因為憲章確立於各地教學的權利。學者和學生因而可隨意到各地的大學教學和學習，教學的共同語言是拉丁語。

中世紀時期，同業行會是獨立自主的組織，根據參加者的知識和技術，來決定讓誰可以成為會員。當時郊區的土地由地主擁有，商業城市則因為同業行會的協助，經濟繁盛，不受封建地主的支配。近乎所有大學都在商業城市成立，並且運用同業行會獨立自主的運作模式。此外，當時的大學亦承傳修道院的教學模式，積年累月地蒐集大量課本，不會重視如何應用知識以滿足當地社會的需要。

早期大學主要由傳統的醫學、法律和神學為專業主宰，加上文法、修辭、邏輯這三學科，還有算術、天文、幾何、音樂這四門高級學科。當時的學者視神學為科學之王，並可以整合所有其它有等級高低之分的、並以法律與醫學高於文理科的知識體系。邏輯與理論知識更被視為高於實踐與應用知識。後來，通過數學應用於自然世界的科學實驗，專門學科日趨受重視。康德提出事實與價值分開的理論，鼓勵學者廣泛探索自然科學，很多社會科學亦因而誕生，例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雖然如此，大學對理論和專門學科依然推崇備至。

儘管大學對歐洲文明的發展功不可沒，但亦有不足之處。直到十

九世紀後期以前，它們一直保持著高度的精英模式，讓應用科技和工業教育在其他類型學府裡發展。在早於中世紀大學的修道院和教堂學校裡，雖然作為學生和教師的婦女也很活躍，但是她們卻被大學拒之門外幾乎長達七百年之久。大學的客觀主義、專門化以及線型邏輯方式，就曾被女權學者認為是源於男性主導的大學傳統。

上述諸多特點解釋了為什麼大學並不適合培訓在十九世紀時以適應大眾化教育所需要的大量教師。全新類型的學府便因此而誕生。這類學府讓女性參與，主張傳授綜合而實用知識和培育清晰的道德觀念，並直接為社區和國家服務。

師範學校與師範大學

師範學校（normal school）與師範大學（normal university）的名稱來自法語，“normale”一字意解“制定道德的標準或範式”。法國大革命過了幾年後，舊大學被廢除，政府需要新的學府為現代法國服務，第一所專上師範學校便於一七九四年創辦。當時國會通過法令，要求這類新學院的教授“以教導道德的藝術來給學生提供課程，並著力塑造年輕公民的心靈以培養公德和私德。”¹ 因此，培養公民

¹ Robert Smith, *Th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and the Third Republi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2), p. 7.

意識和道德發展便成為這類學府的主要目標，其課程的重點是閱讀能力、算術、實用幾何學、歷史、法語文法。這與主導大學的傳統專業及以拉丁語為教學語言完全不同。學生畢業後，會回鄉創辦師範學校，為新興的國家教育制度培育新的教師。

首所專上師範學校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但法國各個大學區都為男女學生開辦了師範學校。學生都是普羅大眾，來自於勞工階層，學校亦招收不少年輕女性以培養小學教師這一新職業。師範學校的辦學理念和特色與過往的大學截然不同。師範學校視教學實踐的優秀為要旨，而不是理論；師範課程以基礎知識領域的綜合學習為主，如數學和語言，與倡揚高度專業化知識學科的大學迥然相異；師範教育明確視學生道德的養成為己任，而大學則注重由強調基礎科學而來的價值中性；師範學校具有一種培養氛圍，師生之間的情感和輔導關係十分緊密，而大學則因學生可任意到不同學院或專業選擇學習，人際環境亦較為疏離；師範學校受到國家的直接監控以及專業的問責，而大學則較為自主和學術自由；師範學校具有很強的責任為當地和國家提供直接的服務，而大學則強調國際化以及獨立於社會。

師範學校為培養法國公立學校的教師貢獻甚巨，以至於在歐洲各地、美國、加拿大、日本和中國都被競相仿效。在英語國家，它們被

稱作師範學校。在英國乃至香港，則被稱為教育學院。不論在哪裡，它們都是第一所開放予女性的高等學府，並且女性對於教學作為一種現代的職業做出了巨大貢獻。²

在一八零六年，拿破侖下令將專上師範學校重建為眾多精英大學的一所。它們變成精英機構，附屬於政府各個部門。獲取錄的學生都在考試取得優異成績，受訓為高級公務員。當時法國的知識份子十分欣賞中國的科舉制度，這種新的教育制度或許也受到了科舉的影響。高等教育被融入官僚制度，以確保能夠培養在許多重要知識領域都合格的公務員，為現代發展服務。

作為頂級的大學形式，法國的專上師範學校依然存在，而且在十九世紀還於不同地方另外開辦了三所。這些學校為師範大學立下模範，在課程中反映出既重視在基礎科學領域的專業學科，也強調作為大學核心課程的人文學科，並融入作為多元性學科和應用領域的、以確保從早期幼童直至高等教育的教學優異的教育領域。現實中，巴黎的師範大學及其姐妹大學主要培養了大學及中學的學者和教師，而師範學校則致力於其它層次的教育。

² Christine Ogren, *The American State Normal School: An Instrument of Great Goo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有趣的是，這種師範大學模式對中國和日本都甚有影響。二十世紀初，法國風大為盛行，很多類似的學院相繼創立，為基礎知識的學科和教育的專業定下很高的標準。這些學院在二十年代教育發展下的命運，亦極富啟示。日本的師範大學受到歐美選擇性的教育理念的薰陶，在二戰前發展得最蓬勃。戰後因為只有美國的影響佔主導，師範大學便退下舞臺。在中國，其歷史軌跡恰恰相反。在二十年代初，因為美國的影響，南京主要的專上師範學校於一九二二年被併入一所綜合性的大學。在一九三二年，北京的男子和女子專上師範學校則被合併為北京師範大學。這所大學雖然只得國民政府相當微薄的支持，但到了一九四九年革命後，因為蘇聯的影響而獨立發展。到了五十年代初，再有五所全國性的師範大學於主要地區成立，此後領導了中國的教育發展。

與此同時，在英美國家，這種師範大學卻從未被創辦。當教育職業幾經爭取以獲得如同醫學、法律、工程專業一樣地位和認同時，師範學校或教育學院獲升格為大學。這最早在美國發生，通過兩種不同的形式。一些師範學校被併入主要的綜合性的大學，成為其教育學院。但在這些大學裡，由於教育學院的地位相對較低，就產生了為爭取在以專業、理論和國際為導向的研究和教學的學術需要，與學校和學校管理部門對為當地需要服務的實際專業知識的需要之間平衡的

持續努力。另外一些師範學校獲升格為地區性的大學，大學以教育為主科，因此學術地位也比較高，但“教育”從未出現在校名之中。³

就這樣，“師範學校”一詞便在英美學術界消失，“師範大學”這個概念也常受誤解。很多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不了解法文“normale”一字的意思是“樹立道德的標準或範式”。很自然，當聽到這個名稱時，他們很容易誤解地問道：“你是否是說那個不是不正常（not abnormal）的學校？”

英美高等教育的模式雖然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中國的教育部卻在二十一世紀堅持保留並發展師範大學。近年來，中國的醫學和工程學科的專業學院，紛紛被合併成更大的綜合大學，但是六所重點師範大學中仍有五所保留了原名並進一步鞏固了在教育領域的領導地位。它們不但為幼童至高等教育各層次的學校培訓教師，還獨領風騷於其他教育領域的發展，包括成人教育、終生學習、專業教育，甚至還包括公共管理、媒體這些新領域。這都大大拓寬了原來法國背景下師範大學的固有特點，並給予教育的領域以更為大的責任和地位。⁴

³ Ruth Hayhoe,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in *Teaching Education*, Vol. 13, No. 1, 2002, pp. 5-23.

⁴ Ruth Hayhoe and Jun Li, “The Idea of a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orthcoming in *Frontiers in Education*, Vol. 4, No. 1, March 2010.

在六十年代的日本，當許多師範學校被升格為地方性大學的時候，教育大學開始誕生。在七十年代，有三所公立的教育大學成立，分別位於新潟縣、德島縣、兵庫縣。另一方面，韓國的國立教育大學在一九八五年創校。它們讓這種新興大學取得了重要地位，並受到認可。我要強調的是，教育大學的先驅是十九世紀的師範學校，而不是那些具有混合價值觀的師範大學。教育大學比師範大學更重視那些綜合化、多學科、凸現道德特性的直接為社區和國家服務的知識。

總而言之，我想對如上比較性敘述中產生的兩個令人好奇的問題，進行一些反思。第一，為何教育大學最先在日韓兩國創立？第二，師範大學在英美沒落，為何會在中國興起？也許我們能夠從對東亞教育傳統的反思中得到回答這些問題的一些啟示。

東方古代文明的教育模式

著名中國教育史學家李弘祺曾指出：中國的古典教育旨在把個人和社會的獲益融為一體。⁵正如《四書》中的《大學》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培育道德、貢獻社會向來最為東亞高等學府所重，即便是受西方影響而開始發展新的知識學科和

⁵ Thomas Lee,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00), pp. 10-11.

在自己的文化環境下汲取西方大學模式。

古代中國科舉的內容也反映了這種觀念，如其四類主要科目經、史、子、集的組織形式。其他所有的科目，包括醫學、數學、農業學、工程學，都被當作對社會有益的科技知識。這四門核心科目並非毫不相關的，也不像歐洲大學那種有高低等級的學科組織。恰恰相反，它們是被以“大學之道”為中心來進行整合的。“經以文字表達道理，以歷史記載事實，哲學家 and 文學家則闡述道的其他方面。”⁶

廣義而言，在東亞課程的傳統之中，教育無疑是最受尊重的知識，並作為一門跨學科的應用知識，對服務於改善社會和個人均具高度的責任意義。而儒家經典中的應用的社會知識比理論的、專門的、以及技術性的知識更受重視。此外，無論是為培養科舉士子的官學或是非正式的學院或書院，師生之間的個人關係至為深厚。

西方大學向來重視的學術自由和自治這些核心價值，卻無法以相同的形式在東亞學府的傳統中找到。相反，東亞對知識權威卻十分重視，體現在學者官員的角色上。他們以自身的學識為百姓和皇帝同時效力。書院也有較多知識自由，書院的學者沒不擔任官職，平常會討

⁶ Bernard Luk, quoted in “Lessons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In R. Hayhoe and J. Pan,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p. 327.

論、爭議並編修經典課程，並根據廣泛的資料綜合出新的、不同的觀點。然而書院並不受法律保護，不像西方大學那樣受到憲章的保護。它們之所以有活力和能力去批評政府，是基於個體學者的獨立思考和強烈的社會意識。

我想指出的是，在理念上中國學術傳統跟師範學校相若，都跟歐洲大學迥異。所以，當思考如何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化壓力時，我們需要從中國的學術傳統尋找啟示來豐富當代的大學。因此，教育大學和師範大學在擔當此任方面具備最佳的條件。

在今天全球化環境下，大學是否會更加自主備受爭議。在歐美大學模式的主導下，就法人地位而言得到較大的自治，新的問責形式如業績指標和質量保證制度，都讓政府更緊地操控高等教育。很多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促成高水準的科學知識以提升在國際舞臺上的經濟競爭力。在此情形下，西方那種強調法律保護的自主模式，需要借鑑東亞的傳統價值來加強。這些傳統價值是學者們關注國家大事，把對青少年的教育視為自己的直接道德責任，並維護社會利益。在這裡我們看到，教育大學對於倡揚道德和精神的價值觀，培養為更美好的社會、世界和自然生態勇於承擔責任的公民等方面，承擔著非常獨特的作用。

最後，我想談談女性在這種遠景下的角色。師範學校和中國傳統知識制度也許稱得上具備女性的特質，例如重視綜合知識、明確的道德觀念、培育性以及社會責任。相反，大學則大多研究狹窄而專門的知識、抱中立的價值觀、遠離社會、認為理論比實踐重要——無論是歷史上還是重要性上皆為如此。雖然中國傳統的高等教育從體制上把女性拒之門外，可是根據近年女權主義的研究，中國的知識模式和女性的認知方式非常接近。

由此可見，東亞學術傳統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遺產，對教育大學有重要啟發。我深信這些傳統有助深化和拓展當今以西方大學模式主導的教育理念，進而使西方的大學模式在促使科學進步以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之外，還能夠擁抱一個社會公正、全球和諧和環境健康的遠景。